

邓小军 鲍远航 著

说唐诗



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中华书局
ZHONGHUA SHUJU COMPANY

唐诗 说唐史

邓小军

鲍远航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说唐史 / 邓小军, 鲍远航著 . —北京 : 中华书局, 2008. 12

ISBN 978 - 7 - 101 - 06335 - 6

I . 唐… II . ①邓… ②鲍… III . ①唐诗—文学欣赏
—青少年读物 ②中国—古代史—唐代—青少年读物
IV . I207. 22 - 49 K242.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0347 号

书 名 唐诗说唐史

著 者 邓小军 鲍远航

责任编辑 夏文芳 刘淑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1/2 插页 2 字数 210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335 - 6

定 价 35.00 元

前　　言

我们是唐人的后代。

很多年前，陇海铁路西行的快车上，白底黑字的站牌一一掠过我眼前：洛阳—新安—潼关，心里不禁涌起一个声音：我正走在杜甫写“三吏”、“三别”的路上！

唐代的诗史，似乎还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今年七月上旬的一天，人民网强国论坛同时出现过两个引用杜诗的帖子，其中一个写道：“通读杜诗，发现诗圣一生都在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呐喊……”

这本小书，从唐诗说唐史，以唐诗为引子，讲述唐史知识，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的一本通俗读物。唐诗中往往可见唐史，所以唐诗不失为激发青少年读者对唐史产生更大兴趣的引子。

唐诗的繁花硕果，是从唐史——唐代社会生活——这棵参天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我们观赏繁花硕果，可以进而观赏生长繁花硕果的参天大树。同样，我们欣赏唐诗，也可以进而了解产生唐诗的唐史。

不少唐诗有对唐史的深刻反映。举三个例子。

第一例，唐诗对贞观之治的深刻反映。杜牧《过魏文贞公宅》诗云：“蟾蜍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这首诗说的是武德九年（626）十月唐太宗即位不久举行的那场决定唐朝政治方向的辩论决策会议。当时，魏徵依据儒家的人性善论，主张

实行儒家仁政；封德彝等则依据法家的人性恶论，主张实行法家高压统治，太宗最后的决策是实行仁政，并且“力行不倦”。到了贞观四年（630），海内安宁，农业丰收，全年全国范围内死刑案件只有二十九件，“几至刑措”。抚今追昔，太宗情不自禁地说：“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见之。”杜牧诗说“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蟪蛄过不了冬，所以不知春秋，喻指眼光短浅、主张性恶论和法家高压统治的封德彝，贤哲指主张性善论和仁政的魏徵。早在贞观元年六月，封德彝就去世了，所以杜牧诗说“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杜牧的这首小诗，精辟地写出了贞观之治的根源。读者诸君知道，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典范。

第二例，唐诗对中书、门下制度和谏官制度的深刻反映。杜甫《北征》题下自注曰：“归至凤翔，墨制放往鄜州作。”诗中云：“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至德二载（757），唐肃宗出自抢夺皇位的阴暗心理，罢免曾为玄宗旧臣的积极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宰相房琯、张镐，诏命三司会审敢于进谏的左拾遗杜甫，最后用一纸墨制放逐杜甫回鄜州省家。杜甫《北征》诗中的这两句是说，实行墨制是破坏了中书、门下制度，诏命三司会审敢于进谏的左拾遗是违背了谏官制度。唐朝的制书敕书，必须经过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查同意，始能成立，否则制敕不能成立。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则是皇帝的公务命令直接下达施行，而不经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查的程序，故无两省之署名与朱印。因无朱印粲然，故名墨制。一句话，墨制就是一张不合法的白条子。唐朝的监察制度，包括专门负责监察皇帝、谏诤皇帝的谏官系统，和专门负责监察百官、弹劾百官的御史台系统。杜甫任职的左拾遗，就属于专门负责监察皇

帝、谏诤皇帝的谏官系统。杜甫的《北征》诗，直接涉及唐朝的中书、门下制度和谏官制度。读者诸君一眼就可以明白，最高决策起草权、审查权分立的中书、门下制度，和专门负责监察皇帝的谏官制度，是唐朝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有意思、最有价值的两大政治制度。

第三例，唐诗对唐与胡化割据的河北之间军事防线的反映。中唐诗人马戴《寄贾岛》诗云：“海上不同来，关中俱久住。”这是说自己与贾岛先后都是从河北取道渤海、东海海路归唐住在关中，而非取道河东（今山西）或河南（今河南）陆路。本来，从河北到关中不必绕道渤海、东海海路，而应直接取道河北与河东或河南之间的陆路，为什么贾岛、马戴都要绕道渤海、东海海路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安史乱后，河北藩镇实行胡化割据，实为当时中国的国中之国，这是陈寅恪所揭示出的中国史上长期被忽视的一大史实。中唐马戴、贾岛都是河北人，却要绕道渤海、东海海路归唐，由此可见，在当时，胡化割据的河北与唐河东、河南之间的陆路并不能随便通过，是被军事防线或军事分界线所切断的。我们再读李翱《韩公（愈）行状》。长庆二年（822），“镇州乱，……诏公往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奏曰：‘韩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诏令至境观事势，无必于入。”（《李文公集》卷11）可见，

胡化割据的河北与唐河东之间，实有一条军事防线或军事分界线（“境”）。我们再读《资治通鉴》卷 238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记载当时人的对话：“师不跨河二十五年矣。”胡三省注：“自德宗讨田悦不克，王师不复跨河。”《资治通鉴》卷 244 唐文宗大和七年八月条：“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大略以为：国家自天宝盗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通鉴》引用杜牧《罪言》，是有卓识。但是杜牧关键的原文，《通鉴》未能引出。杜牧《罪言》说：“天宝末，燕盜徐起，……郭、李輩常以兵五十万，不能过邺。自尔一百余城，天下力尽，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义无有敢窥者。国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樊川集》卷 2）可见，胡化割据的河北与唐河南之间，确实有一条军事防线或军事分界线（“师不跨河”、“畦河修障戍”），故马戴与贾岛归唐，便只能从河北取道渤海、东海海道，而不能取道河东或河南陆路了。马戴《寄贾岛》诗反映了中唐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唐诗对唐史的反映是广大的、丰富多彩的。以脍炙人口的唐诗名句为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包含着唐朝的军事制度；“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可能和唐朝的均田制不无关系；“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反映了唐朝的中外关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反映了安史之乱的现实；“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关系着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的史实；“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背后是唐朝的科举制度；“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背景是唐代士子的漫游风气；“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背景是唐朝经营西北与士人的出塞从军；“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反映

了唐代官员的服饰和等级；“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写照了唐代的风俗和时事。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唐诗对唐史的反映，可以激发我们对唐史的兴趣，或许也可以补充我们对唐史的知识。当然，也可以深化我们对唐诗的认识。

这本小书的读者，想来都是唐诗和唐史的爱好者。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引起读者——青少年读者——对唐诗和唐史的进一步兴趣。

这本书稿由我和鲍远航君分工合作，其中贞观之治、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的关系、唐朝的中书门下制度、唐代士子的漫游风气四章，是我写的，其余各章是由鲍远航君写的。

这本书起因于中华书局的约稿，在此谨向中华书局表示衷心的感谢。

真诚地欢迎读者对书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指正。

邓小军

2008年8月



目录

1 前 言

1 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
——贞观之治

13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
——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的关系

27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唐朝的开拓西域

43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唐朝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

61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安史之乱及其平定

79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

97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唐朝的衰亡



目录

117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唐朝的中书、门下制度

127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唐朝的均田制

143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朝的科举制度

165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唐代士子的漫游

179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唐代士人的从军与出塞

199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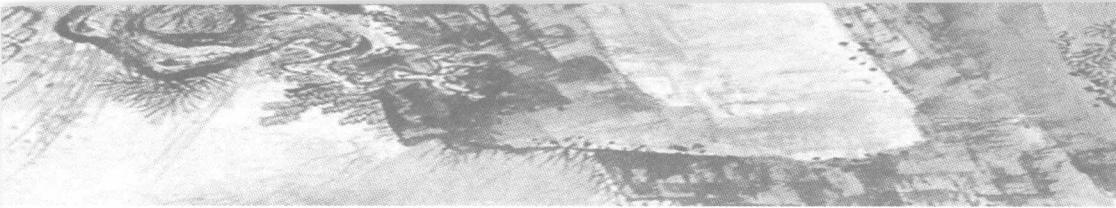
——唐代士人的求仕与隐逸

221 座中泣下谁最多? 江州司马青衫湿

——从服饰看唐代官员的等级

237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唐代的流刑和官员的流放



目录

253.....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唐代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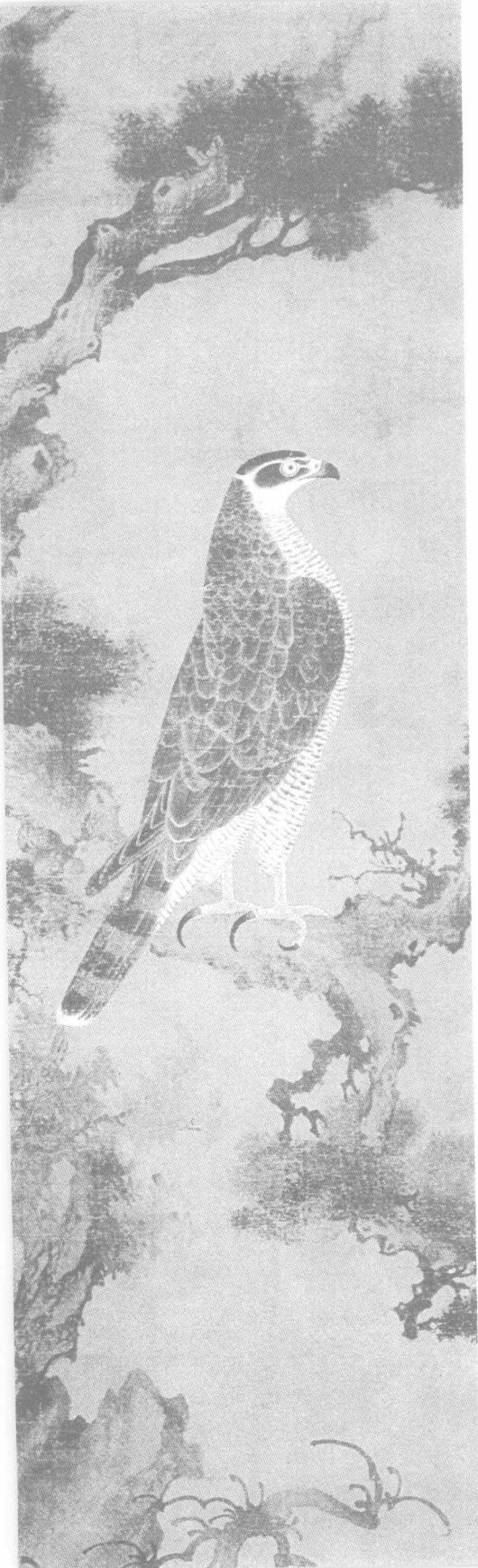
273.....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唐诗中的节令风俗

298..... 引用书目

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

——贞观之治



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
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

——杜牧《过魏文贞公宅》

晚唐小杜这首诗说的是，知了活不过秋天，怎能指望它见到下雪天呢？俗士眼光短浅，怎能指望他理解贤哲之士的高瞻远瞩呢？只可惜，当贞观之治呈现的时候，老天没让封德彝活到这一天——让他亲眼看见天下太平。

在写贞观之治的唐诗中，杜牧这首诗真好。好在哪里？如果把贞观之治比作一棵大树，它也经历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杜牧的诗，好就好在写出了贞观之治是如何生根发芽的。

诗的背后，有一个故事。

性善论与贞观之治

武德九年(626)十月，唐太宗与魏徵等举行了一次讨论古代为政得失的会议。太宗说：“当今大乱之后，不能迅速实现教化（指儒家仁政）。”谏议大夫魏徵说：“不然。民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太平，思太平，则容易教化。所以大乱之后容易教化，好比饥饿的人容易吃饭。”太宗说：“好人治国百年，才能消除残暴。大乱之后，难道就可以迅速实现教化吗？”魏徵说：“这是常人治国，不是圣哲治国。若是圣哲治国，上下同心，人民响应，不求迅速，也会迅速，一个月就可以成功，三年成功，还算是晚的了。”太宗听了，深以为然。右仆射封德彝等人群起反对魏徵，说：“三代以后，人渐浇讹（人心逐渐变坏。浇指薄德，讹指奸诈），故秦任法律（秦朝专用法家高压统治），汉杂霸王道（汉朝混用霸王道，霸道指法家高压统治，王道指儒家仁政），都是想教化而不能，哪里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徵书生，不识时务，若信他的空话，恐败乱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不是换了人民而实行教化的。只要实行教化，就能实现太平。历史记载表明，黄帝、颛顼、商汤、周武王、周成王，也都是在平定乱世之后就实行教化、实现太平的。若言人渐浇讹，不返纯朴，至今应该全都变为鬼魅，怎么还可能实行教化呢？”（见《贞观政要·政体》）封德彝等说不过魏徵，但全都认为不可实行教化。

在决定唐朝政治方向的这场辩论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魏徵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其依据是儒家的人性善论；封德彝等主张实行法家的高压统治，其依据则是法家的人性恶论。太宗最后的决策是采取魏徵的主张，实行仁政，并且“力行不倦”。到了贞观四年（630），海内康宁，农业丰收，全国范围内全年死刑案件只有二十九件，“几至刑措”（几乎没有判刑的事了），“米斗三钱”（一斗米价格三钱，贞观元年一斗米价格是一匹绢）（《新唐书·魏徵传》），东到海滨，南到岭南，行旅不用再带粮食，沿途都有供应了。再加上这时唐朝击破夙敌东突厥，解除了北方的严重边患，唐朝声威远播，四夷君长来贺，尊太宗为“天可汗”。面对这天下太平的大好局面，太宗无限感慨地对侍臣说：“贞观之初，众臣都说人主应该实行威权统治，唯有魏徵劝我行仁义，几年之间，就有了今天的局面，这全是由于魏徵的功劳啊！”又对魏徵说：“玉石不经良工琢磨，和石头没有区别，若经良工琢磨成美玉，便是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以仁义规范我，以道德开导我，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匠。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见之！”（《贞观政要·政体》、《新唐书·魏徵传》）回顾唐太宗即位后那场决定唐朝政治方向的辩论决策会议，即使不用浓墨重彩来书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了。

杜牧诗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出典就是贞观四年三月太宗讲的话：“惜不令使封德彝见之”（《新唐书·魏徵传》）。为什么说是可惜呢？因为早在贞观元年六月，封德彝就去世了。

白居易诗歌称赞贞观之治说：“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又说：“以心感人人心归。”（《新乐府·七德舞》）点出了贞观之治的本质——实行人道政治（历史条件下的人道政治），所以能感动民心，获得百姓拥戴。

那么，贞观之治是如何行仁义的呢？首先，是实行仁政，包括推行均田，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奖励婚嫁，繁育人口，乃至释放宫女三千，从突厥赎回被掠的中原人口近二百万等。同时，实行法治，对贪污腐败者、侵害人民者，一律“必无赦免”，“置以重法”，这

样一来，官员则普遍廉洁奉公，王公贵族、民间豪强则“无敢侵欺细民”。没有这些实行仁政、实行法治的措施，哪有“米斗三钱”、“几至刑措”的局面？所有这些措施的背后，都是一个理念：以民为本。举两个小例子。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君臣理国多劣于前古，何也？”王珪说：“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贞观政要·政体》）贞观二年，太宗说，“国以人为本（唐代文献避太宗李世民讳，民字改写为人字），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可见贞观君臣对于爱民、不扰民这些自古以来儒家的也是道家的政治理想，确实是念念不忘。

所以，贞观之治最值得留心的成就，还是它高质量的文化品质。如果拿汉代、隋代来作比较，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贞观之治与汉代政治的比较

贞观二年（628），太宗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慎所好》）这是旗帜鲜明地表示，贞观之治的指导思想是儒学，也就是上面说到的人性善论、仁政等儒家思想。不妨对比汉代。汉宣帝杀害敢于进谏的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太子刘奭奉劝宣帝说：“陛下用法家统治太深，还是应该用儒家。”宣帝大怒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怎么可能专用儒家？”（《汉书·元帝本纪》）所谓“以霸王道杂之”，其实是以法家高压统治为主，儒家仁政作点缀。宣帝是汉代的第八代皇帝，他的话，是法家政治的自白。

贞观六年（632），太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徵马上对答说：“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贞观政要·政体》）

在历史上,太宗讲出这番话,真是非同小可。因为这等于是公开承认了人民有权推翻无道君主,也就是公开认同了儒家的君权有限合法性思想(君主有道为合法,君主无道为不合法,可以易位,可以诛,可以革命。有道、无道,就看政治的好坏、人民生活的好坏)。这个学说对于统治者,好比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公开承认它,就等于承认人民有权在必要时取下这把剑,对自己开刀。这就促使统治者不能不从切身的利害来考虑人民的利益。太宗、魏徵的对话,说明贞观君臣在儒家的君权有限合法性思想上达成了共识。不妨对比汉代。有一次,在汉景帝面前,儒家学者辕固生与法家学者黄生进行了一场革命是否合法的学术争论。法家是主张君权绝对化的,当然反对革命学说。黄生说:“商汤、周武王诛灭夏桀、商纣,是犯上作乱。”辕固生说:“不对。桀、纣是暴君,汤、武革命,获得人民拥护,是顺应天意民心。”黄生说:“桀、纣虽然失道,仍是君上;汤、武虽是圣人,仍是臣下。臣下诛灭天子,不是犯上作乱是什么?”辕固生说:“那么高祖代秦即天子之位,也错了?”于是景帝发话了:“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是美食家;学者不讨论革命,不算没学问。”从此以后,再没有学者敢讨论革命了(《史记·儒林列传》)。汉景帝下令在革命问题上设立禁区,表明他害怕、反对儒家的君权有限合法性思想。相比而言,太宗开明多了。

贞观十四年(640),特进魏徵上疏,特别提出君主应该尊重臣下,其中引用了孟子的话:“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的意思是说,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臣对君的态度取决于君对臣是否尊重。魏徵上疏中接着说:“作为君主,怎么可以对臣无礼呢!”太宗读了魏徵的上疏,深表赞赏和接受(《贞观政要·君臣鉴戒》)。可见,贞观君臣在儒家君臣关系相对性思想上也达成了共识。而在汉代,尊君卑臣的法家思想是主流意识形态。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总结自己成功的五个原因,其中一个,“自古人文大多厌恶正直之士,公开或不露痕迹地杀害正直之士,历代都有这样的事。朕即位以来,正直之士